

##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张海鹏

文章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9月

###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张 海 鹏

**【摘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近代以来的历史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假设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如何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也有助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在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前提，社会主义与工业化是同时展开的；在当今形势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依然是我们开展各项事业的基本路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混淆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国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的企业、银行，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随即也成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经过将近60年的探索和发展，虽然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与60年前相比，我国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在文化领域，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中国为什么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回答很简单，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说明和理解。

首先，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相对帝国主义而言）和民主进步（相对封建主义而言）。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取得了引导中国走向何种道路的主导权。在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有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并未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民国初年由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有可能通过推翻清政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被清政府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运动以后，国家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前进方向有清楚的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从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并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号召，鼓舞着广大人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以消灭中共为目的的内战，结果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这个结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第二，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之一是大同思想。《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老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比较容易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例如，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他最看重的是民生主义，使用的英文词是Socialism，这个英文词通常被翻译成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翻译成民生主义更好，有时候，孙中山直接用社会主义来说明他的民生主义主张。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并不是要反对资本和资本家，只是要反对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防止资本家垄断所产生的社会流弊。

由于民生主义学说中蕴含若干与社会主义相近的设想，因此往往被评价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孙中山又强调，他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又说，“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三，从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来看。1929—1933年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深陷入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恐慌之中，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迅速彰显。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及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对未来中国发

展道路进行思索时，不少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达到高潮。

第四，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来看。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引起了知识界、工业界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消灭中共为目的，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新政协决议，拒绝组织联合政府，发动内战，使得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共的政治、经济主张。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以上四点，充分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知识分子的理解、民主党派的拥护，就连工商界也不反对。这就是为什么1953年提前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十分顺利的原因，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上这些观点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商榷。

问题一，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吗？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经过长期辩论；还有人提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思潮或主义有两种：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传播和实施都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民主义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那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孙中山虽然批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却承认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和圣人，而且宣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人篡改。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有戴季陶的三民主义，有蒋介石的“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这些“三民主义”都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宣布“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才是使革命继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进行后一个革命，两个革命是相联结的，中间不能横插另一个阶段。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进方向必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吗？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一是分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二是分析了资本的运行规律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定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包括殖民侵略的血与火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第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推动，中国人开始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国家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而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武装，最终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问题二，一些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许也会发展得很好。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历史发展中的假设？

首先必须指出，后人从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任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举例来说，人类是从猿猴变来的，我们可否假设当初猿猴变成的不是人类，而是别的什么动物，那么地球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这样的假设无助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以前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

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假如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是否中国会发展的更好呢？我看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未曾经历过这样的道路。我们可以看看类似国家的状况。

首先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40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也是唯一走通了这条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的需要、要把日本扶植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在战后的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再看印度。印度是我国的西南邻邦。印度早于中国近20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独立的时间和我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不难回答的问题。

苏联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发展均可抗衡美国，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提高；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等方面，美国已经不把它放在眼里了。

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缅甸、泰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曾是荷兰的殖民地，也曾被日本占领。这些国家都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

拉丁美洲各国早在19世纪初就进行独立战争，逐渐摆脱殖民地地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比中国更好呢？

非洲大陆长期是欧洲殖民诸国的殖民地，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摆脱殖民地地位。那些国家大体走的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类型的道路，大多数非洲国家至今还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

回顾环球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上述假设可以设想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之下，在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发展的现状会比1949年以前好多少呢？

问题三，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迟迟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跟传统文化有关系吗？

大同理想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十分复杂，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精华的部分，是维系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糟粕的部分，是拖后腿的部分。中国封建社会迟迟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跟这种糟粕有一定的关联。譬如，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长期固定在士农工商这样的层次上，工商处在社会底层，不为人们重视，这与西方社会的重商精神是相背离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主要反映在《礼记·礼运篇》。它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对公平、公正社会的一种乌托邦追求。几千年来，大同理想除了保留在思想家的著述中，还保留在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近代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康有为也曾撰写过《大同书》，描述过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社会，他主张公有制应该成为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大同社会里，农工商各业一概归公，个人不置私产，“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财产公有、社会福利、分配公平可能有某种契合的地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在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这一点上与社会主义建立了某种思想联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古代的大同理想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孙中山在广州讲民生主义时是能够抓住听众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去教育群众是能够为群众所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严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

问题四，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这个问题是学术界常常引起讨论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认识到，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有两个历史发展主题，一个是民族独立问题，一个是国家富强问题即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就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解决国家富强即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要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近代中国，只有首先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才有可能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已经证明了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际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才大规模开始的。这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里进行现代化事业，我们的现代化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60年的探索和奋斗，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效的。

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是可以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社会的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扫除旧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前进的障碍，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经济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7世纪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也同样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也是在18世纪中叶发动了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才使美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而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获得国家的独立后开始现代化进程的。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十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提出了这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带有个人价值判断的、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倾向的假设，因为假设不以任何历史事实为根据，所以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益于假设的、有价值的证明。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都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当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革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恩格斯在讨论能不能用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这个问题时说过：“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且身体力行、做出成绩的人，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就是鼓吹“议会政治”的人在当时对冲击封建专制制度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历史事实也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历史条件下，单靠这些办法是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前进的根本问题的。“如果这些办法能解决问题，谁还偏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去投身革命呢？”第四，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由于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政府，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农村基本的经济形态是地主所有制，但是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现代工厂和生活方式，即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政治、经济生活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革命几乎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能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而假设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第五，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了社会改良的过程，只是改良道路走不通，才不得不走革命的道路。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历了一个试验、探索、失败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过程。清朝末年，在国内外形势的压迫下，清廷也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最终形成了试行君主立宪制的想法，但是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没能形成共和制的决策。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希望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道路。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清末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所攫取。民国初年，国民党控制了议会多数，宋教仁真心走议会道路却被袁世凯暗杀。袁世凯又以武力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宣布取消国民党，取缔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从而确立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也在历史上宣布了政党政治的失败，宣布了走议会改良政治的道路走不通。此后，军阀混战，曹锟“贿选”，把议会政治的外衣也撕去了。从此，老百姓对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完全失望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试行“训政”制度，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试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开始摸索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民主制度。

总之，在革命和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第一，不能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第二，一般来说，革命成功后现代化是必然趋势；第三，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只搞现代化不搞革命的。

问题五，当前思想理论界泛滥着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认为，不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而是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认定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它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通过民主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保留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这些理论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曾经是工人运动内的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从制度来说，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思想来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是

《共产党宣言》所批驳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于读过《共产党宣言》，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常识。

在当今形势下，有人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共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歪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程中的努力目标。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的发展。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过：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共产党宣言》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事业就能又好又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能顺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就会越打越牢，向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就具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长期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方法，有时候也需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化解这些矛盾，使国家、社会、稳步、平和地发展。在国家统一、国际间斗争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在和平、和谐的环境里解决冲突和矛盾，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了在国际间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共产党人要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自己的理想信念结合起来，与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支撑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我们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为丰富、财富分配极为平等、社会生活极为民主和个人自由得到极大发挥的基础上，那是真正和谐的时代。只知道眼前的和谐目标，忘记了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是短视的表现。当然，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民主的、法治的、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可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作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妥的，是一种歪曲。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否定，而是对长期以来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善；不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否定，而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所谓“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点；所谓“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国家建设的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说，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本原则下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邓小平多次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会，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以及2007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规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原则的贯彻和实施，它是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沾不上边的。我们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作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要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制约，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些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把市场经济无限扩大化，显然是违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宪法原则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需要从广泛的社会实践经验中加以总结和理论的升华。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基础的前提下，在国家宏观的、计划的经济思想指导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恰当结合后形成的经济运作体制。不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指导，只强调市场经济的运用，只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忽视国家计划对市场经济的制约作用，我们的经济体制将难以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区别。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发展和创新，脱离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脱离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现实状况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多次强调反对自由化的重要性。他说过：“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

的十几年里，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个论断是极其重要的。那些坚持私有化、坚持市场化、坚持议会制的言论，像所谓“新西山会议”所主张的那些言论，像所谓“零八宪章”所主张的那些言论，像今天宣传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那些言论，显然就是自由化的言论了。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及其经验，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有了重大变化，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两个“毫不动摇”首先是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近代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如果中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中国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融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只是灾难，不是幸福，这是可以预言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9月《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11-20 9:07:00 点击1180)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